

[DOI] 10.19653/j.cnki.dbejdxxb.2024.04.001

[引用格式] 周文,刘守英,郑红亮,庞明川.专题笔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4(4):3-18.

专题笔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

周文,刘守英,郑红亮,庞明川

编者按: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东北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本期组织策划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专题笔谈,特邀复旦大学周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红亮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庞明川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分别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关于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几个问题”“深化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从两个维度认识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为题,研究阐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要求。现予刊发,以飨读者。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实践问题;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24)04-0003-16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周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力与推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重点是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质变”跃升的关键力量

新质生产力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契合,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前

收稿日期:2024-06-12

作者简介:周文(1966-),男,重庆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研究。E-mail:zhou59201@163.com

进方向相一致,是承接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生产力新质态。因此,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质变”跃升的关键力量。从形成过程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传统生产力对于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日益衰落,科技创新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前沿科技与先进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一系列富有生机活力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经形成并切实改变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新质生产力正是在继承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在实现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瓶颈突破的过程中产生的^[1]。从核心特征来看,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所具有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目标紧密契合。从演进趋势来看,新质生产力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科技进步引发的创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之源,不断升级壮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质生产力会随之持续演进,并引发科技与产业的新一轮变革,在当下与未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力与推动力。

(二) 新质生产力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

现阶段,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分离”的调整适应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与传统的生产力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别:首先,创新成为主导性因素。科技创新深入渗透并与生产力三要素紧密结合,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革新生产工具及发掘新型生产要素等方式,深刻重塑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形态、功能与耦合方式,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转变。其次,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中国家只有加速发展最前沿、最新兴、最具潜质的技术,才能逐步缩小这一差距^[2]。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新质”并非是普通的技术、产品或商业模式的创新所引发的生产力提升,而是由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引发的生产力“质变”^[3]。最后,技术突破、资源配置与产业升级三者有机融合,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之源。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为契机,各层次、各领域的先进技术将加速迭代、交叉融合、彼此成就,形成广泛、持续的技术变革。技术突破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奠定物质与技术基础。先进产业的发展又成为新一轮技术变革与管理方式创新的源头,由此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动力循环机制。

(三) 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都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在根本宗旨与基本特性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首先,在根本宗旨上,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来看,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是为了解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同样服务于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于共同富裕这一发展目标^[5]。从发展的动力来看,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型生产工具的出现将节省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为劳动者开展精密作业或创造性生产提供更加智能和精准的辅助。新生的就业岗位需要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型劳动者,由此会形成促使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扩大专业知识储备、提高创新创造能力的强大推动力。专业型和复合型的人才队伍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二元目标得以有机统一、更好实现。其次,在基本特性上,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都蕴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特征,都将安全作为保障发展的重要因素。“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区分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质态的概念表达^[6],随着中国经济质态发生显著改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涵的新发展理念随之诞生。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

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发展”^[7]。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严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上升,安全也被作为重要因素纳入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着力点

(一) 推进原创性关键性技术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中国若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首先,要提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若干自主研发、世界领先的尖端技术,拥有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前沿技术,全面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第一,加大对科技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第二,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第三,建立健全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激情和活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科技研发和创新实践。其次,要形成系统协调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的加速产生与产业化应用提供广阔平台与坚实保障,形成系统协调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第一,推动各级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建立开放、包容、合作的科技创新环境,打破部门壁垒,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和流动。第二,加强对科技成果的保护和转移,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供有力保障。第三,加强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打造一支高水平、创新型的科技人才队伍,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 推进新型工业化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产业结构高度的历史提升,而新的产业革命与产业结构质态演进通常始于科学与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因此,可以将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理解为“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关系到新质生产力能否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使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牵引与支撑作用,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首先,要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有机衔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其次,要以新型工业化为推进路径,以数字化、绿色化赋能产业结构深层次变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才能发挥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和引领作用,进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三)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经济规律,激发社会生产活力与创造力。现阶段,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而且涉及发展方式转换和体制机制调整。如果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便难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这一先进生产力当中所蕴含的发展新动能也难以得到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现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首先,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其次,要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科技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促进资源互通、技术交流与平台共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以获取更多的技术、市场和资源支持。

三、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 增强内在动力: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走自主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当前, 世界经济波动巨大, 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受限加大了中国的经济安全风险。仅仅依靠模仿学习科技创新实现的“非对称赶超”难以为继, 只有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克服“卡脖子”难题, 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国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迈进, 进而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要求,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发展。

首先,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发挥公有制经济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协同作用, 依靠公有制经济在关键领域的生产资料占有优势, 最大程度地提升举国体制效率, 形成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合力。其次, 完善创新体制, 统筹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面向国家发展需求,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以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共同推动生产力跃迁。最后,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生产力转化。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 发挥产学研协同作用, 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形成产业化合力, 推动科技成果落地。

(二) 培育支撑载体: 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实体经济具有生产性功能, 是生产力的载体, 是国民经济的根基, 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支撑载体。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表明, 没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充分发展, 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经济的现代化。因此, 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 既要加强实体经济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 形成新产业、新业态, 又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首先, 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数实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在加大社会财富创造和提高生产力的同时, 不断催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面对未来, 要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 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促进物联网、AI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加快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 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数字经济监管, 深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治理, 更好地发挥平台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作用。其次, 要发挥金融资本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金融是连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工具, 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第一, 要加快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优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 破除科技与金融部门间、产业间的制度壁垒。第二, 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 在利用国家资金进行引导的同时, 拓宽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 提升融资可得性。

(三) 强化持续保障: 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石。同样, 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过程。因此, 要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首先, 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 实现产业链向高端迈进。产业体系高端化离不开产业技术智能

化,随着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将持续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要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利用数据、算力等新兴生产要素,搭建智能化数据平台、自动化设备和智能制造系统,实现生产与资源管理智能化,对产业链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其次,践行产业绿色化理念,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要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加快实现绿色低碳技术的重大突破与融合应用,推动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发展好循环经济等绿色新经济模式,以绿色生产力助推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体系。最后,加强产业融合化能力,促进产业体系多维度协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提升产业间的配套协作能力,以产生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持续保障。要强化不同产业间跨界创新、自主创新,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发挥平台企业作用,打破不同行业的产业创新壁垒,加速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优势产业集群;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发展,政府要加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等不同类型产业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发挥区域内龙头企业的作用,带动引领区域内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提升产业链水平。

关于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几个问题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一、理解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回到马克思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到《资本论》时,马克思讨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更多地落在了生产关系,即怎样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去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实际上是先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研究的基本背景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所以,尽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讨论生产关系如何去变革,但本质是在生产力发展后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社会变革。

理清整个脉络后,笔者认为,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首先就是要认识到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的理论里面,这一点是前提。也就是说,讨论生产关系的前提是什么?是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制度变革。

后发国家的困境是什么?因为后发国家未能先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赶超,通过建构制度和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先有生产力发展以后再进行制度变革。从苏联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即是如此。因为生产力落后,所以先变生产关系,制度变革先行,通过制度变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在这些国家的实践就变成了先变生产关系,先搞制度改革、搞制度改造,后面的改革、转型只是对之前的矫正。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进程,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社会,通过变革

作者简介:刘守英(1964-),男,湖北洪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土地制度与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城乡互动研究。E-mail: liusy18@126.com

生产关系建设一个现代国家。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很落后，也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必须进行制度革命，改变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立新的制度，建立政权，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改革，本质上也是基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生产力落后的认识，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也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还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总而言之，学术界在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对作为为什么要变革生产关系的前提的生产力的发展重视不够。在实践上，为了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先变生产关系，靠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试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现代国家。这是中国的理论传统，也是中国的实践。

这一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笔者认为，是回到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逻辑，即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其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了，已经不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初期的状况了，包括科学技术、产业体系和生产要素组合。国家已经不是在生产力落后状况下谋发展了，不必通过生产关系先行来寻求发展了。其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四梁八柱”定下来了，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定型，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要素参与分配，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梁八柱”定下来以后，就不必要在基本制度上左右摇摆了。在基本制度定型的前提下，改革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出现不适应时，进行生产关系的调适。这就回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了。其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就是通过创新、产业升级、技术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发展模式转型，证明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理解创新的意义：科技0→1突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第二个问题是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传统生产力的关键问题是，在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不是没有科技进步，但基本上是模仿性创新，我们就是靠这种创新支撑着产业的演进和转型升级，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中国四十多年来的产业变迁得益于产品复杂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产品复杂度指数在全球的位次提升，如上海、江苏和浙江排名很靠前。其实际上就是靠模仿性创新带动整个产品和产业复杂度提高，使知识进入到产品和产业创新体系。

有一张全球产品空间图，它把全世界的产品分布比喻成一个森林。中国的出口产品从最初的产品复杂度很低，不断地向全世界的产品复杂度最高的空间靠近。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中国的一些复杂度高的产品跟美国短兵相接了。再不做原始创新，靠模仿性创新已经走不下去了，“卡脖子”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么来的。马克思讲科技是单一的生产要素，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0→1突破是核心。科技突破的标志是0→1，从原来的1→100，转变为0→1突破，即原始创新，必须在基础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如果再没有0→1的原始创新，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模式必须从模仿性创新转向突破性创新。

三、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方式：生产要素新组合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实现新质生产力？笔者认为，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组合实

现高效的要素配置。如何实现高效的要素配置?关键是将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所形成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实现新的发展模式。本质是这个问题。

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奇迹,实际上得益于传统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不断提升。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第一个是土地。中国利用了土地的自然独特性和制度独特性,创造了以地谋发展模式。制度的独特性表现为二元土地所有制和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土地推动高速增长以及土地资本化创造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土地配置推进低成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第二个是劳动力,即依靠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红利形成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第三个是模仿性创新,助推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产品复杂度提高及其在世界产业体系的竞争力提高。第四个是资本,即依靠外延的资本扩张来增加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传统生产力形成传统发展模式,传统发展模式不单单是体制问题,而是在传统生产要素组合下形成的一套适应当时发展阶段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这套组合从2012年以后问题频发,以地谋发展模式开始衰竭,经济发展阶段发生转变,已经不可能再靠高速增长来维持传统模式了。土地发动机功能减退,人口红利下降,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工资成本上升,模仿性创新遇到“卡脖子”问题,资本扩张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也就是说,传统的生产要素组合形成的发展模式在那个阶段是适合的,所以能产生非常大的奇迹,2012年以后这个组合和发展模式不行了。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形成科技突破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此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四、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目的:寻找发展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就在于,要以此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重要?是因为旧动能难以为继了,以土地为核心的这套发展动能已经衰竭了。旧动能衰竭以后,新动能到底怎么接续?发展生产力最主要的是要有新动能。土地动能没有了以后,什么是新的动能?例如,数字经济到底能否成为新的发展动能?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可能带来新的生产力变革和产业革命,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一个文明形态的出现会有一系列表现。每一次的工业革命,均是先有科学革命,再有技术应用革命,然后出现产业革命,最终形成新的经济形态和文明形态。数字经济可能成为新的文明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活动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活动的空间和方式基本上就是人地关系,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稀缺,活动空间就是土地空间、资源空间,特别是土地空间。工业文明时代,主要的推动力是资本和技术进步。它的活动空间是一个实体空间,是一个物质空间。经济活动的空间正在发生变化,虚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活动空间。

二是生产要素发生变化。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最主要的是改写了生产函数。土地已经进入K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生产要素了,这里面劳动数量和质量是一个,L是一个,K是一个,另外是技术进步。笔者认为,在结构快速转变阶段,土地创造的资本要单列出来,不能把它记到K里面去。土地创造那么多的资本,怎么能就直接放到K里面去。从数字文明的角度来看,数据是否或者是如何成为生产要素,我们是否要改写生产函数了?例如,原来劳动、资本还在,技术进步还在,数据是否进入生产函数表达式,怎样进入生产函数表达式?

三是如果作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话,组织方式会发生变化。在农业文明时代,基本组织形态就是农户(主要以小农为主),农户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组织形态是工厂制度。到数字文明时代,笔者认为,基本组织形态就是平台,其不单单是一个在平台上买卖的交易,而是一种完全重构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组织形态。

四是社会治理的秩序结构发生变化。即通过数字来重构一个社会的治理，形成新的秩序，最后就形成一个形态，塑造文明的形态。

在传统生产力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当中，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是否出现，其标志是什么，对于判断新动能的能级和方向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数字文明现在只是“曙光”，还没有真正变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有点类似于珍妮纺织机，其要变成普遍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标志，还有一个过程要走，但是会出现一个新的形态。在这个形态形成的过程中，数字动能不断累积，逐渐成为发展的新动能和主引擎。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否成功，取决于新的动能能否培育起来。这个要等机会，如果中国认准了这个方向，推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发展动能，就能形成数字文明的新形态。

五、理解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革命：绿色革命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应该是与历次的生产力革命一样，要带来产业革命。如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带来产业革命，那新质生产力就无所谓“新”。所以一定是要表现出新的产业革命，一定要有新的产业。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生产力就不是新的。

在数字文明时代，这一轮新的产业革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笔者并不认同将中国现在的整个产业称为第几次工业革命之类的。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革命，应该是绿色发展模式形成的新产业形态。以数字牵引的新的产业革命，它的基本表现是与工业革命时代的产业革命不一样的形式，就是绿色革命。绿色革命的本质，就是一种新发展模式，从过去的以资本、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以绿色作为发展动能的新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绿色发展模式是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是绿色带动增长的新发展模式。在产业形态上有一些比较乐观的表现，例如，新能源汽车，它实际上是一种绿色发展模式。中国的汽车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其主要原因是清洁和智能，这可能是新一轮产业革命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此外，像风能发电，包括光伏，不断替代传统的煤电，也是替代传统的发展模式，带来能源革命、绿色的发展模式。新能源汽车等已经表现出新的产业形态，这些产业形态实际上是以绿色为特征的新发展模式。

六、理解传统生产力：不等同于落后生产力

现在很多人认为传统生产力和传统产业是落后的，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一些地方的腾笼换鸟等。笔者在陕西安康毛绒玩具产业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那些工人没有出去过，都是原来在农村的一些老太太，还有一些年轻人，经过8个月的培训就可以上手，而且做的毛绒玩具产业不是学术界原来理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其给迪斯尼做，给日本的动漫做，那是有高度创意的，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那种乡镇企业。这里的启发在于，传统生产力可以转型升级，千万不要把传统生产力等同于落后生产力。笔者认为，传统的产业、传统的生产力里面落后的要淘汰，例如，土地动能一定要转型。但是传统产业经过不断升级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一定要保护好。保护的方式就是与更有效的生产要素组合，包括科技。另外也要利用好传统的要素，例如，在安康的那些人现在不出去，都在本村，原来扶贫工厂那些人，在那里培训，然后很快就能按照那套模式发展起来，而且工人也不用像原来那样离开家乡，就在本村工作，还可以带孩子，工作也很灵活。对传统生产力的保护，还要有策略地淘汰传统生产力里面一些落后的生产力，

不能一刀切地去把它给干掉。总之,传统生产力不等同于落后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要进行有效的组合,利用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转型升级,其中也包括科技。

深化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

郑红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自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并在其后的几次重要讲话中系统地作了论述之后,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跟进研究的热潮,对学术界准确理解总书记的理论并指导实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在梳理概括现有研究(因篇幅所限,主要局限于学术刊物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今后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国经济学界开展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若干关键节点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7日在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9月8日在听取工作汇报后又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由此开启了中国学术界研究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热潮。^①

2023年10月28日,在由广西大学主办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论坛上,高培勇作了题为《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旨报告。他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与当下的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能够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新的竞争力和持久动力。这是笔者最早听到的学者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的阐释。从学术论文发表的时间看,周文和许凌云^[3]的《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一文,应该是比较早的。文章指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需从“新”“质”两方面把握。其后,高培勇^[8]在题为《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和路径》一文中也对新质生产力概念作出了阐述。文章指出,需把新质生产力当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为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进程中着力培育和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指明了方向。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点,高帆^[9]在其文章中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促使人们思考与此相关联的经济理论,如新质生产力的测度等。

进入2024年,中国经济学界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部署为契机,掀起了新一轮研究热潮。洪银兴^[10]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新旧动能的转换。在宏观上可以把新质生产力概括为新科技、新能源和新产业以及促使这三个方面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盖凯程和韩文龙^[11]在国内首部新质生产力专著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新发展阶段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集群,以及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智库研究方面,由中国生产力学会主办的首届新质生

① 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发言时间和新闻报道时间上的差异,后来有的学者在文章中将后一个发言称为“首次”,或者在辅导报告中将后面发言中的这一句放到2023年9月7日的发言中了。这虽然不影响学术界对精神实质的理解,但从严谨性上来看还是有所欠缺的。

作者简介:郑红亮(1958-),男,浙江丽水人,编审,教授,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企业制度比较、公司治理、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研究。E-mail: zhengh199@sina.com

产力大会于2024年1月18日在深圳召开, 该会议发布了首届新质生产力企业榜单, 并启动成立新质生产力研究院^[12]。

研究如何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 经济学界继续在前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发表了一组“新质生产力研究专稿”共4篇文章, 接着在第4期又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文章。这些研究成果的集中推出, 无疑能推动经济学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具体将在本文下一节中展开分析。

二、经济学界对现有研究的若干评论意见

根据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 当一个主题的研究持续到一定的时间, 后续的研究就会对前面的成果作出一些总结评论, 以开启新的研究领域或视角。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赵峰和季雷^[13]认为, 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一主题, 现有文献主要是从新质生产力提出的逻辑、强调科技创新之决定性作用、突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形态和产业形态、探讨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等方面作出讨论。周文和许凌云^[1]认为, 当前人们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也存在误区。例如, 将传统产业排除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之外, 否认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并形成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 混淆生产力进步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边界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14]认为, 学术界迄今的研究大致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视角展开: 其一, 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线索, 研究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的新内涵, 提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二, 从技术变革和创新理论视角出发, 阐述新质生产力的演化规律。其三, 讨论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在这些评论的基础上, 重点对《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新质生产力系列文章的独特之处做一个简要的讨论。刘伟^[15]认为, 新质生产力理论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 并非否定劳动价值论, 相反, 是将其引入新质生产力、引入中国高质量发展命题, 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这表明, 一些西方经济学中已经使用的概念范畴完全可以用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任保平^[16]分析了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系的重要性, 认为其中之一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方敏和杨虎涛^[17]分析了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制度政策问题, 认为能否把中国的自然禀赋等优势转化为现实, 还需要深化改革, 为迎接新质生产力创造积极有为的制度空间和政策环境。孟捷和韩文龙^[18]从唯物辩证法观点出发, 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需要深刻认识并处理好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以上4篇主要还是以思想性见长的理论思辨型文章的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14]则在思辨的基础上有了经验实证研究的风格。文章从“科技创新—结构变迁—效率变革”这一生产力发展逻辑出发, 通过国际比较, 阐述了当前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和今后的原则方向。该文章认为, 虽然目前已有不少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但鲜有文献从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研究新质生产力, 因而这一角度具有创新性。这种理论与经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分析, 无疑有利于深化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研究。

三、对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

综合中国学术界的现有研究, 笔者认为今后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理论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三方

面入手:

(一) 加强实证研究, 为深化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证据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但实践也经常走在理论的前面,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例子。最为典型的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俗称“大包干”, 首先就是在安徽凤阳等地由农民自己搞起来, 后来得到了正式认可并在全中国成功推广, 推动了农村经济大发展, 研究这个主题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虽然提出时间还不长, 但它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中国实践中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作用等经济现象的观察总结和提炼概括的结果, 也证明了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 新的发展实践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和数据, 等待着学术界去进一步挖掘研究。

宋佳等^[19]基于2015—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实证研究了ESG(环境、社会 and 治理)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其中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关于企业产权异质性的影响, 即非国有企业ESG发展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作用比国有企业更大。韩文龙等^[20]认为, 目前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测度研究有两方面的不足: 一方面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系统变革, 另一方面指标选取上没有很好地体现先进性特质。针对此, 文章以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为基础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利用2012—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新质生产力水平, 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等。

这些探索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尤其是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 必将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 就像十多年前樊纲等构建的市场化指数, 为后来的许多实证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积极推动了不少领域的研究进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实证特性赋予了其鲜明的实践特质: 经济学理论和原理的提出及其能否成立, 需要经受经济现实的不断拷问和验证, 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运用经验数据的文章, 其数据可能一时还不完善, 但它也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现有文章构建的指标体系或指数, 肯定也不会那么完善, 但其为各方面分领域的经验研究提供了重要抓手, 也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完善打下了基础。这就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渐进性, 即不可能每篇文章都是突破性的, 但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边际贡献。理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 为理论大厦的最终建成添砖加瓦。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研究可能也是这个道理,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理论指引下,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 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经验实证研究, 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后续应该很快会有新的好作品出现。

(二)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开展国际比较, 找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便更好地迎头赶上

虽然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必须承认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 那更是差距很大, 对于所谓的“卡脖子”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寻求解决之道。而这些关键技术领域, 这些“卡脖子”问题, 都是新质生产力要发展和突破的领域。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没有用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 但就其生产力布局和发展来看, 是有与中国一一对应领域的。由于其是经济先行国家, 在这些对应领域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 都值得中国去深入研究借鉴, 使自己少走弯路。首先, 如前面所讲到的, 实证研究的结果能够更清晰地呈现出中国目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究竟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有总体上的发展指数, 也有分领域、分行业甚至分区域的发展指数, 并且有纵向的新质生产力历史演进轨迹及其规律性的总结。其次, 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现状及发展演化历史的观察研究, 了解其规律性并为我所用, 当然不是照搬照套。最后, 与这些国家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 找出差距及存在差距的各方面原因, 尤其是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 为中国今后如何缩小这些差距, 以及要采取哪些政策和体制改革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三) 加强生产关系方面的研究, 深化体制改革, 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

一是研究推进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 2013年11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有深刻论述,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作了强调。因此, 应该进一步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快推进相关改革,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适宜的市场和体制环境。例如, 金融体制方面, 如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财税体制方面, 如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健全地方税体系, 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建设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方面, 如何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有序推行反垄断监管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

二是研究如何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其中民营企业贡献的创新成果一般能达到70%以上, 说明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大有可为。但是, 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还受到很多制约, 其中所有制偏见是重要的方面。正因如此, 社会上才时不时地会冒出诸如“私有制消灭论”“民营经济离场论”等看似“正义”实则脱离社会主义阶段现实、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口号, 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在现实层面, 则是“玻璃门”现象频发, 不少行业对民营企业来说是看得见、进不去, 行政垄断亟须打破。因此, 应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和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方针政策, 按照“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原则行事, 为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21]。

三是研究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证明, 开放可以促进改革, 开放本身也是一种改革。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要成功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需要创造符合其要求的众多条款, 其中就有要求缔约国必须确保国有企业独立运营、公平竞争, 要求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等。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相关方面的改革, 例如, 国有企业改革要弱化行政性垄断, 强化预算硬约束, 加强公司治理。这样, 对内可以使民营企业更公平地参与竞争, 提升整体经济的活力; 对外也可以避免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被无端地指责为扭曲竞争, 从而使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有一个更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两个维度认识 政府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

庞明川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全面振兴研究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有着自身固有的生成与运行逻辑, 而且还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过程中, 政府虽然能够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这种作用不是万能的, 是有一定前提和约束条件的。因此, 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政府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 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庞明川(1963-), 男, 四川西充人, 研究员,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 pmc2004@dufe.edu.cn

一、从政府—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维度看政府的作用

由于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政府则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因而政府可以通过推动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来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是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相对于其他创新主体而言，企业既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具有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敏、创新意愿强烈、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机制灵活等突出优势，因而可以有效地连接技术和市场，迅速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企业逐渐摆脱完全依附于政府的从属地位，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随着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充分激发和释放，并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策源地。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企业的定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将企业的定位从技术创新主体提升为科技创新主体，进一步丰富了主体的内涵。此后，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则强调“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因此，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尤为重要。

二是政府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始终扮演着主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党始终高度重视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在新中国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就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上，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2]。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命题。后来，他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3]¹⁰⁸。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推进科技强国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政府虽然不是创新主体，但却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总体上看，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主要体现在引导和支持上。具体地说，在引导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瞄准科技前沿，部署和实施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重大工程项目，组织实施周期较长、风险较大且企业不愿投资的基础性、前瞻性和公益性项目，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和加大政策引导等；在支持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建立与完善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和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财政金融支持，建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等。

三是由于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政府又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因而政府可以通过助推科技创新来更快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调研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产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因此，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在2023年12月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颠覆性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没有科学技术的关键性突破, 就没有新质生产力。然而,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 由于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政府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和支持方面, 因此, 政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只能是通过推动企业充分发挥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来实现, 做好“裁判员”“服务员”, 而不是作为“运动员”亲自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二、从职能转变—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维度 看政府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而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与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现代化生产力形态,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关键抓手。长期的实践表明, 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都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计划经济时期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的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当然, 社会各界对于政府职能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不仅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探索过程, 而且伴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而改变。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和定位, 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24]。这一探索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两个转折点: 其一, 国家提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认识尚不充分, 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过细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自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以来, 政府如何管理经济就成为这一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 将政府职能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全行业管理等方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进一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作出界定。其二, 国家提出政府的“四大”“五大”基本职能。党的十四大奠定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调和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进行明确的定位, 在强调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 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政府职能进行拓展, 形成了“四大”职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了划分, 强调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 提出“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展为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五大”职能, 并明确赋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的职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宏观调控”职能修改为“经济调节”, 将“环境保护”职能修改为“生态环境保护”, 提出“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新“五大”职能。实践表明, 政府职能从“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到“四大”职能再到“五大”职能的每一次拓展, 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二是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生产力, 并

强调资产阶级仅用不到一个世纪的统治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就远超历史所有时代的总和^[25]。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存在明显不足,在转轨实践中经济发展方式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不同阶段的艰辛探索。即便这一时期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但市场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显现:凡是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经济发展态势也比较好。对此,如何认识和界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作用,理论上的定性和突破尤为重要。关键的转折点在于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³⁷³的著名论断,其不仅从根本上打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也从理论上廓清了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自此开始,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逐渐明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总体上都将市场作用的认识定位在“基础性”层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到“决定性”,这不仅是在市场作用认识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也无疑会使市场发挥出比起“基础性”作用时更大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作用。当然,无论是“基础性”作用还是“决定性”作用,其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得以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6]。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造,给中国带来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从而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三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述分析表明,政府职能的转变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也能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但是,政府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其既存在政府作用的边界,又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样地,市场的作用也不是无穷尽的,其也存在作用的边界和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地界定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强调既要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既能以积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来发展生产力,又能有效防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带来的风险;既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有效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从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既可以通过推动企业发挥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又可以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无论哪一种方式,政府都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前瞻性、战略性、规划性和指导性,包括制定并实施发展战略与中长期规划,实施相关支持政策,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具体而言,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来说,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做好顶层设计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制度体系和营造制度环境,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持,从而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来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于在科学界定自身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实现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转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协同作用等。

当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角色定位是不同的。从推动科技创新的角

度看,中央政府侧重于宏观的引导与支持,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制定规划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地方政府则更多地侧重于提供地方性的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自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划分以来,中央政府侧重于宏观事务管理成为一条基本经验。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宏观上的引导和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则在于做好相关的支持和服务。总之,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推进高质量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周文,许凌云.再论新质生产力: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J].改革,2024(3):26-37.
- [2]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6.
- [3]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4]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12):1-13.
- [5] 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J].社会科学辑刊,2024(2):114-124.
- [6]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 [7]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7.
- [8] 高培勇.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和路径[J].经济学动态,2023(12):3-13.
- [9]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10] 洪银兴.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社会科学文摘,2024(5):81-83.
- [11] 盖凯程,韩文龙.新质生产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II.
- [12] 中国生产力学会秘书处.“2024首届新质生产力大会”亮相深圳[J].生产力研究,2024(2):2.
- [13] 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学习与探索,2024(1):92-101+175.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杨耀武,等.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4):4-23.
- [15]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3):4-11.
- [16] 任保平.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经济研究,2024(3):12-19.
- [17] 方敏,杨虎涛.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J].经济研究,2024(3):20-28.
- [18] 孟捷,韩文龙.新质生产力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J].经济研究,2024(3):29-33.
- [19] 宋佳,张金昌,潘艺.ESG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管理,2024(6):1-11.
- [20] 韩文龙,张瑞生,赵峰.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6):5-25.
- [21] 郑红亮,齐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理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评论[J].中国经济问题,2024(1):17-29.
- [2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 [2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09.
-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6.

(责任编辑:刘欣琦,徐雅雯)